

城镇居民分配公平满意度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孙敬水 林晓炜

【内容提要】深入研究城镇居民对现阶段分配公平满意程度的认知、判断与评价，对于政府制定科学合理的调控政策、促进分配公平，提高居民满意程度，维护社会和谐与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文章以浙江城镇居民为例，对现阶段收入分配公平满意度相关问题进行问卷调查，构建Ordered Probit 模型，对分配公平满意度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城镇居民对分配公平满意度相对较高；起点公平、过程公平、结果公平、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社会保障、制度因素、家庭在职工作的人数对分配公平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起点公平、社会保障、人力资本、制度因素对分配公平满意度正向影响程度较大，过程公平、结果公平、家庭在职工作的人数对分配公平满意度正向影响程度次之，而物质资本对分配公平满意度正向影响程度较小。这一研究结果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

【关键词】起点公平；过程公平；结果公平；分配公平满意度；人力资本

DOI:10.14167/j.zjss.2016.09.014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居民收入显著增加，社会总体处于和谐有序的运行状态。然而，社会发展相对滞后，分配不公平、贫富分化、城乡差距拉大等经济社会问题渐趋严重（Gustafsson 等，2008；Whyte，2010）。居民对分配公平状况的满意程度对一个社会的稳定与发展至关重要。居民对收入分配的不公平感将产生社会不满情绪，容易激化社会矛盾，从而产生大量的社会问题（Wilkinson 和 Pickett，2009），居民对收入分配的不公平感还容易促使他们产生阶层对立意识（翁定军，2010）。收入分配不公平问题对中国经济转型形成挑战。因此，党的十八大再次强调“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制定“十三五”规划建议明确指出“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规范初次分配，加大再分配调节力度”。在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研究城镇居民如何评价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收入分配公平状态，尤其是对当前初次收入分配公平和再分配公平的满意程度，对于政府制定科学合理的调控政策，促进收入分配公平，提高城镇居民满意程度，维护社会和谐与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述评

在不同的文献中，对于分配公平满意度概念的使用并不一致，如有的研究使用“分配态度”、“分配公平感”、“收入满意度（或收入满足度）”等概念，在本研究中，这些都作为与分配公平满意度类似的概念。

（一）分配公平满意度的内涵及其影响因素

* 本文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173189）、教育部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博导类课题（20123326110003）、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LY14G030003）、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课题（14NDJC015Z）资助。

作者：孙敬水，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林晓炜，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杭州310018）

理论界对于分配公平满意度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Jasso 和Wegener（1997）认为，分配公平感是人们对社会重要资源分配公平程度的主观判断、评价和态度。Soltan（1982）认为，分配公平感是居民对社会有价资源的分配方式或分配结果在道德上所能接受的程度。有的学者认为，机会和结果是公众判断社会资源分配是否公平的基本维度（Kluegel 和Mateju，1995），分配公平感也是人们对自己及整个社会收入分配过程和结果是否公平的态度和判断（王甫勤，2010）。而有的学者认为，与结果公平相比，居民对自己向上流动的公平机会的感知在现实中也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Whyte，2010；Wang Feng，2010；Wu，2009）。

分配公平满意度受很多因素的影响，不仅受经济因素的影响，还受非经济因素的影响。不仅受客观因素（如个人与家庭基本特征等）的影响，还受主观因素（如对腐败程度的感知等）的影响（Knight 等，2009；Han 和Whyte，2009）。

1. 社会经济地位与分配公平满意度。社会经济地位（如绝对收入）被认为是影响分配公平感的主要因素，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越认为当前的收入分配状况是公平的；相反，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越低，越认为当前的收入分配状况是不公平的（Shepelak 和Alwin，1986；Robinson 和Bell，1978）。绝对收入的增长，能够满足个人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增加满意度。Schyns（2001）和Tremblay等（2013）研究发现绝对收入水平对收入满意度产生绝对的影响：收入越高，满足的程度越高。而Protot 和Rustichini（2015）研究表明边际收入满意度会随收入的增加而不断缩小。Ng 和Allen（2005）认为，个人的分配公平感是由其在分配过程中的实际获益程度决定的。个人从当前的分配中获益越多，越认为当前的收入分配状况是公平的，反之相反。Bishop 等（2014）通过对中国居民收入相关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分配公平满意度与个人的实际收入、对前景的预期高度相关。Schneider和Shamon（2015）研究发现：人们对于收入分配的公平感会随着他所处的收入等级不同而变化，处于不同的收入层次时，对收入分配的公平感也将相应变动。国内学者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傅红春和罗文英（2004）研究发现，居民收入满意度与收入呈正相关，居民较低的收入水平，降低总体收入满意度。郑方辉和隆晓兰（2008）研究表明，在一般情况下，收入满意度会随收入增加而增加，但是边际满意度在不断减小。史振华（2015）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个人绝对收入的提高，能提升收入满意度；城镇居民的收入满意度高于农村居民的收入满意度。

2. 局部比较理论与分配公平满意度。局部比较理论认为，个人的收入满意度受到相对收入的影响。相对收入包括相对于别人的收入（横向相对收入）、相对于自己过去的收入（纵向相对收入）、相对于自己贡献的收入等。相对收入越高，分配公平满意度越高。有的学者认为，影响个人分配公平感的不仅仅取决于自己社会经济地位的高低，而且基于个人生活环境所进行的局部比较（Kreidl，2000；Wang Feng，2008）。局部的信息既可能源于人们对过去生活的体验与感受（Wegener，1991），也可能源于人们对周围人状况的感知与评价（Festinger，1954；Frank，1985；Taylor 和Lobel，1989）。如果与过去收入相比，或与周围人的收入相比，认为自己收入状况改善了，那么会更认同当前的收入分配状态。很多研究表明，收入分配满意度与个人相对收入呈正相关。相对收入地位较高的群体，其收入满意度也较高（Clark 等，2008；Schyns，2002；D，Ambrosio和Frick，2007）。Becchetti 和Pelloni（2013）研究结果表明，与他人相比收入较低时，预期自己未来将获得较高收入，则收入满意度会提高。Kifle（2013）研究发现，相对收入的效应是不对称的，即收入低于参照目标所感到的不满意度要高于收入高于参照目标所增加的不满意度。Dumludag（2014）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相对收入对收入满意度的正向影响在转型国家比较明显，而在发达国家却不明显。

3. 公正启发理论与分配公平满意度。公正启发理论（Lind，2001）强调了公正判断的重要性并探索了公正判断的形成过程，认为如果觉得程序是公正的，由于产生了一般的公正判断，就会认为结果也是公正。该理论被应用于收入满意度研究，并认为过程公平会对人们对结果公平的判断产生重要影响。在该理论的基础上，Wang 等（2014）通过实证研究区分了结果公平与过程公平在判断收入水平满意度过程中的影响，发现过程公平对收入满意度有正向影响，但此影响要小于结果公平对收入满意度的影响，并且过程公平是通过对结果公平的影响来间接影响收入满意度的。Eisenkopf 等（2013）从机会层面研究了收入分配的不公平感，研究发现当人们在一些重要资源面前机会不均等时，很容易唤起他们在收入分配方面的不公平感。文雯（2015）从机会层面、规则层面、结果层面、其他因素等方面，实证研究了影响个体收入分配公平感的几大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居民对机会不公平、规则不公平和结果不公平的认知是影响分配不公平感的主要因素。

4. 个人与家庭基本特征与分配公平满意度。居民个人性别、民族、年龄、家庭人口数、家庭劳动力人数等个人与家庭基本特征会影响分配公平满意度。Keaveny 和 Inderrieden (2000) 认为, 个人的性别会影响收入满意度。因为男女需要的收入不同, 相同收入对收入满意度的影响不同。女性的满意度较高, 而男性的满意度较低。国内学者也认为, 性别会影响劳动者的收入满意度, 年轻女性的收入满意度高于男性的 (罗文英, 2008)。Ferrer-i-Carbonell 和 Van Praag (2003) 认为影响收入满意度的因素有收入、家庭结构、家庭规模等, 并且收入满意度与收入呈正相关, 与家庭规模呈负相关。Deaton (2010) 研究发现个人年龄影响满意度。个人在年轻时, 满意度相对较高, 而在年龄更大时, 感受到的满意度下降, 即个人年龄与满意度呈现倒“U”形关系。居民受教育程度对收入分配公平感的影响相对复杂, 有的学者研究发现, 受教育程度越高, 对收入分配的公平感就越强 (Hayo 和 Seifert, 2003; 李颖晖, 2015); 而有的学者研究表明, 受教育程度越高, 对收入分配感知的不公平感就会越强 (倪青山等, 2015)。

5. 社会保障、社会流动、社会资本等其他因素与分配公平满意度。除了以上几个主要因素外, 中外学者还从社会保障、社会流动、社会资本等方面对分配公平满意度的影响进行了有益探讨。李春玲和魏中龙 (2012) 研究发现, 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对农村居民收入满意度的贡献率排在第二位 (位于收入之后)。栗治强和王毅杰 (2014) 研究结果表明, 社会保障对居民的公平感有显著正向作用。Christian 等 (2009) 以及 Grosfeld 和 Senik (2010) 研究发现社会流动程度的不同会影响到收入不公平与人们的满意度之间的关系, 当人们所感知到的社会流动比较高时, 收入不公平与人们的满意度是正相关的, 而当人们感知到的社会流动比较低时, 收入不公平与人们的满意度却是负相关的。史振华和李树 (2014) 探讨了社会资本对收入满意度的影响, 研究发现, 城市外地户籍居民与城市本地户籍居民有显著性差异。Shahpari 和 Davoudi (2014) 探讨了一国物质资本对收入分配公平感的影响, 研究发现物质资本能够提升分配公平满意度。

(二) 对现有相关研究的评述与本文的主要贡献

以上相关研究为进一步探讨居民分配公平满意度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有待进一步探讨。第一, 理论界对分配公平满意度内涵及其影响因素的探讨, 往往局限于结果公平, 而且分歧比较大, 很少考虑起点公平 (或机会公平)、过程公平 (或规则公平) 对分配公平满意度的影响。在我国, 由于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在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等方面差异较大, 因此只有将三者结合起来, 才能更准确地反映分配公平满意度的内涵及其影响程度。第二, 现有相关研究多数从社会经济地位、局部比较理论、公正启发理论、个人与家庭基本特征等方面对分配公平满意度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单独讨论某一特定因素较多, 而利用问卷调查数据, 从人力资本 (如工作经验、健康状况、文化程度)、物质资本、社会保障等视角探讨分配公平满意度影响因素较少。第三, 现有相关研究还缺少对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满意程度的问卷调查。

本文与现有相关研究相比, 其主要贡献有以下几点: 第一, 本文对起点公平 (基础教育公平满意程度、就业公平满意程度、公共卫生公平满意程度、公共基础设施公平满意程度、公共资源公平满意程度)、过程公平 (市场竞争环境满意程度, 取缔非法非正常收入满意程度, 公职人员廉洁满意程度, 政府政务公开、公共信息透明度满意程度)、结果公平 (个人收入水平、收入与个人贡献相比满意程度、收入与过去三年相比满意程度、收入与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比满意程度) 等相关问题进行问卷调查, 从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 (绝对收入与相对收入) 等方面对分配公平满意度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 得出了具有启发意义的研究结论, 这在现有相关研究中是没有涉及的。第二, 利用最新问卷调查数据, 构建计量模型, 除了考虑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外, 本文还从人力资本 (如健康状况、工作经验、受教育年限、职称)、物质资本 (如住房面积)、个人与家庭基本特征 (如性别、年龄、民族、家庭人口和劳动力)、社会保障 (社会保险满意程度, 社会救助、社会优抚、社会福利满意程度, 帮扶弱势群体状况满意程度)、制度因素 (如工作单位) 等方面对分配公平满意度的影响因素进行 Ordered Probit 模型分析, 这在现有相关研究中也是很少见的。

三、研究方法 with 调查样本

(一) 研究方法

由于本文使用的变量——居民对分配公平满意度的基本判断（用变量 DJ 表示，取值 1、2、3、4、5），属于有序离散选择变量，因此可以构建 Ordered Probit 模型，对分配公平满意度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本文构建如下 Ordered Probit 模型（李雪松，2008）：

$$DJ^* = x'B + \varepsilon \quad (1)$$

其中，x 为分配公平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列向量（x' 为 x 的转置行向量），B 为参数列向量，假设为相互独立的随机变量， $\varepsilon \sim N(0, 1)$ ，其分布函数为 F。DJ* 为分配公平满意度 DJ 的潜在变量，DJ 与 DJ* 存在如下关系

$$DJ = \begin{cases} 1 & DJ^* \leq c_1 \\ 2 & c_1 < DJ^* \leq c_2 \\ 3 & c_2 < DJ^* \leq c_3 \\ 4 & c_3 < DJ^* \leq c_4 \\ 5 & c_4 < DJ^* \end{cases} \quad (2)$$

其中， c_1, c_2, c_3, c_4 为 4 个未知的临界值分界点，满足 $c_1 < c_2 < c_3 < c_4$ ，待估参数为 $\{c_1, c_2, c_3, c_4, B\}$ 。

上述模型即为 Ordered Probit 模型， $DJ=j$ （ $j=1, 2, 3, 4, 5$ ）的概率为

$$\begin{aligned} \text{当 } DJ=1, P(DJ=1) &= P(DJ^* \leq c_1) = P(\varepsilon \leq c_1 - x'B) \\ &= F(c_1 - x'B) \\ \text{当 } DJ=j (j=2, 3, 4) \text{ 时}, P(DJ=j) &= P(c_{j-1} < DJ^* \leq c_j) = \\ &= P(c_{j-1} - x'B < \varepsilon \leq c_j - x'B) = F(c_j - x'B) - F(c_{j-1} - x'B) \quad (3) \\ \text{当 } DJ=5, P(DJ=5) &= P(DJ^* > c_4) = 1 - P(\varepsilon \leq c_4 - \\ &= 1 - F(c_4 - x'B) \end{aligned}$$

定义 $c_0 = -\infty, c_5 = +\infty$ 则上式可以统一表示为

$$P(DJ=j)=F(c_j-x'B)-F(c_{j-1}-x'B) (j=1,2,3,4,5) \quad (4)$$

多元有序选择模型参数估计一般采用极大似然估计方法，而且几个临界值也是未知的，与回归系数一起在极大似然估计中估计得出。多元有序选择模型的对数似然函数为

$$\ln L = \sum_{i=1}^N \sum_{j=1}^5 z_{ij} \ln [F(c_j - x_i' B) - F(c_{j-1} - x_i' B)] \quad (5)$$

其中N 为样本容量， z_{ij} 定义为：当 $DJ=j$ 时，则 $z_{ij}=1$ ，否则 $z_{ij}=0$ 。

令对数似然函数的全部一阶导数都等于0，即

$$\begin{cases} \frac{\partial \ln L}{\partial B} = 0 \\ \frac{\partial \ln L}{\partial c_j} = 0 \end{cases} \quad (6)$$

$$(7)$$

利用迭代法可以得到式（6）、式（7）中参数B 和 c_j 的估计值。

（二）调查样本

由于分配公平满意度涉及较多主观指标，而这些主观指标数据无法从统计年鉴上获得，因此只能采用问卷调查法获得个体微观数据。问卷设计包括两部分：一是被调查者的个人与家庭基本信息。二是从起点公平、过程公平、结果公平等方面，对被调查者对当前分配公平满意度相关问题的主观判断与评价方面的调查。本次问卷的调查对象为城镇家庭户主、农村家庭户主，采用随机抽样方法，调查范围涉及浙江省内11 个地区。2015年上半年，课题组共发放问卷1000 份，回收问卷823 份，去掉信息不全或数据异常的样本，最终得到有效样本480 份。在调查分配公平满意度时，国内外很多学者使用的方法，是让被调查者在一个数字序列（如1-5）或描述序列（如非常不满意到非常满意）直接选择一个数字，来表示自己满意度的高低（Kapteyn 等，2013）。本文亦采用类似的方法来测量居民分配公平满意度。由于本项目研究对象涉及主观判断与评价问题，因此在设计个人分配公平满意度的答案时采用了李克特量表法（Likert scale），用0-5 的数字来表示满意程度，其中5 表示非常满意，4 表示比较满意，3 表示一般满意，2 表示不太满意，1 表示非常不满意，被调查者能够很方便地表明自己的态度。

四、分配公平满意度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分配公平满意度是社会成员对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心理认知、主观判断与评价。本文基于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的问卷调查，构建多元有序选择模型，对分配公平满意度主要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并分析其影响程度。

（一）变量与模型

根据分配公平满意度的主要影响因素，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分配公平满意度 DJ ，解释变量及符号如下（见表 3）。（1）户主个人及家庭基本特征：设置 5 个变量，即性别 $male$ 、民族 han 、年龄 age 、家庭人口数 pop 、家庭在职工作的人数 $work$ 。（2）人力资本：设置 7 个变量，即健康状况 $heal$ 、工作经验 $expe$ 、受教育年限 edu 、职称 tit_j ($j=1, 1, 3$ ，符号含义见表 1)。（3）物质资本：设置 1 个变量，即住房面积 $hous$ 。（4）制度因素：设置 5 个变量，即工作单位 $unit_j$ ($j=1, 1, 3, 4, 5$ ，符号含义见表 1)。（5）起点公平：设置 4 个变量，即基础教育公平满意程度 $satis_1$ 、公共医疗卫生公平满意程度 $satis_2$ 、公共基础设施公平满意程度 $satis_3$ 和就业公平满意程度 $satis_4$ 。（6）过程公平：设置 4 个变量，即市场竞争环境满意程度 $satis_5$ 、取缔非法非正常收入满意程度 $satis_6$ 、公职人员廉洁满意程度 $satis_7$ 、政府政务公开和公共信息透明度满意程度 $satis_8$ 。（7）结果公平（绝对收入与相对收入）：设置 4 个变量，即户主个人可支配收入 y 、收入与个人贡献相比满意程度 $satis_9$ 、收入与过去三年相比满意程度 $satis_{10}$ 、收入与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比满意程度 $satis_{11}$ 。其中，第一个变量涉及绝对收入，后三个变量涉及相对收入（用于公平比较、纵向比较、横向比较）。（8）社会保障：设置 3 个变量，即社会保险满意程度（主要指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 $satis_{12}$ ，社会救助、社会优抚、社会福利满意程度 $satis_{13}$ ，帮扶弱势群体状况满意程度 $satis_{14}$ 。因此 $x' B$ 有如下形式

$$x' B = \beta_0 + \beta_1 \ln y + \beta_2 male + \beta_3 han + \beta_4 age + \beta_5 age^2 + \beta_6 pop + \beta_7 work + \beta_8 heal + \beta_9 \ln(expe) + \beta_{10} \ln(edu) + \sum_{j=1}^3 \beta_{10+j} tit_j + \beta_{14} \ln(hous) + \sum_{j=1}^5 \beta_{14+j} unit_j + \sum_{j=1}^{14} \beta_{19+j} satis_j \quad (8)$$

其中， β_0 为常数项、 β_i 是回归系数，模型中各变量含义如表 1 所示。

（二）对现阶段收入分配公平满意度的基本判断

对于现阶段居民对分配公平满意度的基本判断，问卷调查统计结果显示，被调查者对目前分配公平满意度均值为 3.02（见表 1）。从被调查者选择分配公平不同等级的满意度所占比例看，居民选择非常满意的占全部样本的 2.93%，选择比较满意的占 16.74%，选择一般满意的占 52.09%，选择不太满意的占 23.22%，选择非常不满意的占 5.02%。将非常满意、比较满意、一般满意列为满意，不太满意与非常不满意列为不满意，得到全部样本的满意度为 71.76%，不满意度为 28.24%。可见，居民选择分配公平满意度所占比例较高。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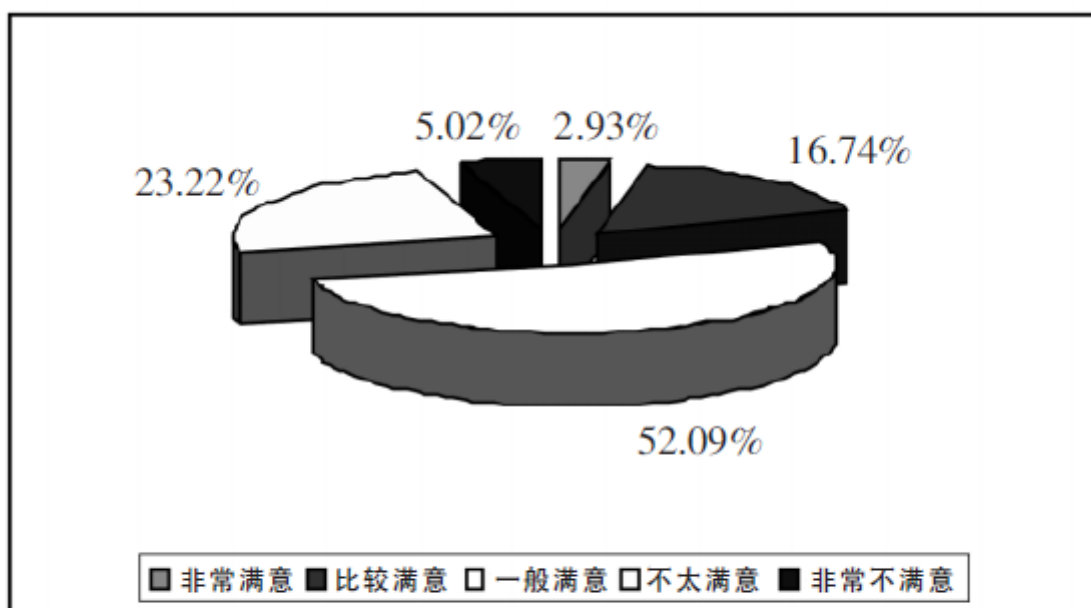


图 1 被调查者选择分配公平不同等级的满意度所占比例

从分配公平的三个阶段看，居民对过程公平的满意程度相对较低，对结果公平的满意程度相对较高，居民对起点公平的满意程度居中，但总体相差不大。在起点公平的四个指标中，居民满意程度从高到低排序依次是基础教育公平满意度、公共基础设施公平满意度、公共医疗卫生公平满意度、就业公平满意度；在过程公平的四个指标中，居民满意程度从高到低排序依次是市场竞争环境满意度、取缔非法非正常收入满意度、政府政务公开和公共信息透明度满意度、公职人员廉洁满意度；在结果公平的三个指标中，居民满意程度从高到低排序依次是收入与过去三年相比满意程度、收入与个人贡献相比满意程度、收入与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比满意程度（如表 1 所示）。

（三）Ordered Probit 模型结果分析

根据上面的研究方法，利用计量软件EViews6.0对Ordered Probit 模型估计后，得到表2、表3 回归结果。在表2、表3 中，LR statistic 统计量较大，对应的显著性水平较高，分配公平满意度Ordered Probit 模型显著成立。表2、表3 中模型1至模型8 依次主要反映了个人与家庭基本特征、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制度因素、起点公平、过程公平、结果公平（绝对收入与相对收入）、社会保障对分配公平满意度的影响。

1. 个人与家庭基本特征对分配公平满意度的影响。表2 中模型1 回归结果显示，性别male 对应回归系数均为负值（说明男性对分配公平满意度低于女性）且不显著。民族han 对应回归系数为正值（说明汉族居民对分配公平满意度高于少数民族居民）且不显著。年龄age 一次项为正值不显著，二次项age² 为负值且在10%水平上显著，说明户主年龄与分配公平满意度呈现倒“U 型”关系。家庭人口pop 对应回归系数为负值（说明家庭人口越多，分配公平满意度越低）但不显著。家庭在职工作的人数work 对应回归系数为正值且在10%水平上显著，表明家庭在职工作的人数越多，选择分配公平满意度的概率越高。

2. 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对分配公平满意度的影响。表2 中模型2 回归结果显示，健康状况heal、工作经验expe、受教育年限edu、职称tit 均在1%的统计水平上对分配公平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个人健康状况越好、工作经验越丰富、受教育年限越长、职称越高，选择分配公平满意度的概率越高。其中健康状况、工作经验、受教育年限对分配公平满意度的正向影响程度大于职称对分配公平满意度的影响程度，高级职称对分配公平满意度的正向影响程度大于初级、中级职称。表2 中模型3 回归结果显示，住房面积hous在5%的统计水平上对分配公平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家庭住房面积越多，选择分配公平满意度的概率越高。

表 2 分配公平满意度模型估计结果之一

解释变量	模型 1 (个人与家庭 基本特征)	模型 2 (人力 资本)	模型 3 (物质 资本)	模型 4 (制度 因素)
lny	0.142**	0.141**	0.137**	0.138**
male	-0.113	-0.119	-0.111	-0.122
han	0.468	0.431	0.459	0.381
age	0.091	0.112	0.090	0.092
age ²	-0.001*	-0.001*	-0.001*	-0.001*
pop	-0.088	-0.090	-0.091	-0.081
work	0.113*	0.109*	0.112*	0.098*
heal	0.331***	0.336***	0.230***	0.328***
log(expe)		0.157***		
log(edu)		0.164***		
tit1		0.110***		
tit2		0.123***		
tit3		0.130***		
log(hous)			0.024**	
unit1				0.314
unit2				0.346*
unit3				0.306
unit4				0.248*
unit5				0.219
LIMIT_2:C(1)	1.420	1.323	1.537	1.545
LIMIT_3:C(2)	2.565	2.468	2.682	2.693
LIMIT_4:C(3)	4.207**	4.116**	4.324**	4.346**
LIMIT_5:C(4)	5.343***	5.254***	5.461***	5.496***
LR statistic	22.041***	24.155***	22.099***	27.685***

注：***、**、* 分别表示回归系数在 1%、5% 和 10% 水平上显著。

3. 制度因素（工作单位）对分配公平满意度的影响。表2 中模型4 回归结果显示，相对于其他工作单位，中央国有企业unit4、港澳台及外商企业unit1 在10%的统计水平上对分配公平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相对于工作单位以外的其他变量，两者对分配公平满意度影响程度较大；党政机关或事业单位unit5、地方国有企业unit3、民营企业或个体经营unit2 对分配公平满意度有正向影响，但不显著。

表 3 分配公平满意度模型估计结果之二

解释变量	模型 5 (起点公平)	模型 6 (过程公平)	模型 7 (结果公平: 绝对收入与 相对收入)	模型 8 (社会 保障)
lny	0.104**	0.117**	0.108**	0.130**
male	0.115	0.102	0.101	0.105
han	0.424	0.417	0.465	0.449
age	0.072	0.166*	0.072**	0.087**
age ²	-0.001*	-0.0011*	-0.0011**	-0.002**
pop	0.009	0.090	-0.083	-0.086
work	0.072*	0.088*	0.085*	0.111*
heal	0.212***	0.212***	0.231***	0.266***
satis ₁	0.572***			
satis ₂	0.078*			
satis ₃	0.228*			
satis ₄	0.262*			
satis ₅		0.116***		
satis ₆		0.110***		
satis ₇		0.013***		
satis ₈		0.013***		
satis ₉			0.163***	
satis ₁₀			0.154***	
satis ₁₁			0.121***	
satis ₁₂				0.363***
satis ₁₃				0.203***
satis ₁₄				0.311***
LIMIT_2:C(1)	3.403*	6.725***	4.400**	6.771***
LIMIT_3:C(2)	4.784**	8.505***	5.639***	8.429***
LIMIT_4:C(3)	6.713***	10.902***	7.441***	10.597***
LIMIT_5:C(4)	8.113***	12.691***	8.724***	12.218***
LR statistic	161.94***	330.24***	98.483***	267.59***

4. 起点公平对分配公平满意度的影响。表3中模型5 回归结果显示， 基础教育公平满意程度satis1、公共医疗卫生公平满意程度satis2、公共基础设施公平满意程度satis3和就业公平满意程度satis4在1%-10%的统计水平上对分配公平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公共医疗卫生公平满意程度对分配公平满意度的正向影响程度较小，其他三个变量正向影响程度较大。

5. 过程公平对分配公平满意度的影响。表3中模型6 回归结果显示， 市场竞争环境满意程度satis5、取缔非法非正常收入满意程度satis6、公职人员廉洁满意程度satis7、政府政务公开和公共信息透明度满意程度satis8均在1%的统计水平上对分配公平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市场竞争环境满意程度、取缔非法非正常收入满意程度对分配公平满意度的正向影响程

度较大，而公职人员廉洁满意程度、政府政务公开和公共信息透明度满意程度对分配公平满意度的正向影响程度较小。

6. 结果公平（绝对收入与相对收入）对分配公平满意度的影响。表2 中模型1 回归结果显示，户主个人可支配收入 y 在5%的统计水平上对分配公平满意度有显著影响，对应回归系数均为正值，说明户主个人收入越高，选择分配公平满意度的概率越高。表3 中模型7 回归结果显示，收入与个人贡献相比满意程度 $satis9$ 、收入与过去三年相比满意程度 $satis10$ 、收入与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比满意程度 $satis11$ 均在1%的统计水平上对分配公平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三者正向影响程度相差不大。说明收入与个人贡献相比、收入与过去三年相比、收入与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比，其满意程度越高，选择分配公平满意度的概率越高。

7. 社会保障对分配公平满意度的影响。表3中模型8 回归结果显示，社会保险满意程度 $satis12$ ，社会救助、社会优抚、社会福利满意程度 $satis13$ ，帮扶弱势群体状况满意程度 $satis14$ 均在1%的统计水平上对分配公平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社会保障程度越高，居民对分配公平满意度也越高。

五、结论、启示与展望

本文基于城镇居民家庭问卷调查数据，分析了城镇居民对现阶段收入分配公平满意度，构建了Ordered Probit 模型，对分配公平满意度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到以下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结论一：现阶段城镇居民对收入分配公平满意度较高。从分配公平的三个阶段看，居民对结果公平的满意程度相对较高，对起点公平的满意程度居中，对过程公平的满意程度相对较低，但三者总体相差不大。在起点公平指标中，居民对基础教育公平满意程度较高，对就业公平满意程度相对较低；在过程公平指标中，居民对市场竞争环境满意程度较高，对公职人员廉洁满意程度相对较低；在结果公平指标中，居民对收入与过去三年相比满意程度较高，对收入与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比满意程度相对较低。

结论二：起点公平、过程公平、结果公平（绝对收入与相对收入）对分配公平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起点公平（基础教育公平、公共医疗卫生公平、公共基础设施公平、就业公平）、过程公平（市场竞争环境、取缔非法非正常收入、公职人员廉洁、政府政务公开和公共信息透明度）、结果公平（户主个人收入水平、收入与个人贡献相比、收入与过去三年相比、收入与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比）满意程度越高，居民选择分配公平满意度的概率越高。其中基础教育公平满意程度、公共基础设施公平满意程度、就业公平满意程度对分配公平满意度的正向影响程度较大；而公共医疗卫生公平满意程度、公职人员廉洁满意程度、政府政务公开和公共信息透明度满意程度对分配公平满意度的正向影响程度较小。

结论三：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社会保障、制度因素对分配公平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个人健康状况越好、工作经验越丰富、受教育年限越长、职称越高，选择分配公平满意度的概率越高。其中健康状况、工作经验、受教育年限对分配公平满意度的正向影响程度较大。物质资本（住房面积）越多，其分配公平满意度越高，但正向影响程度较小。社会保障程度越好，居民选择分配公平满意度的概率越高。在制度因素方面，中央国有企业、港澳台及外商企业分配公平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两者正向影响程度较大。

结论四：户主年龄与分配公平满意度呈现倒“U 型”关系，家庭在职工作的人数对分配公平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男性对分配公平满意度低于女性、汉族居民对分配公平满意度高于少数民族居民、家庭人口数与分配公平满意度负相关，但三者均不显著。户主年龄与分配公平满意度呈现倒“U 型”关系。家庭在职工作的人数对分配公平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家庭劳动力越多，分配公平满意度越高。

（二）政策启示

根据本文的研究结果，得到以下重要启示：

第一，确保起点公平、过程公平、结果公平是提高城镇居民分配公平满意度的重要途径。本文研究结果表明，起点公平、过程公平、结果公平对分配公平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影响程度较大。因此，就起点公平而言，要保障城镇居民在参与经济活动时，享有平等的权利，平等的参与机会和发展机会。实现基础教育、公共医疗卫生、公共基础设施均等化，保障劳动者就业机会公平将有助于提高居民分配公平满意度。

就过程公平而言，要保障城镇居民在参与经济活动过程中，按照公开公正公认的规则平等竞争。打破垄断、优化市场竞争环境，取缔非法非正常收入、避免权力寻租和腐败、提高公职人员廉洁程度、提高政府政务公开和公共信息透明度，使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保障规则公平将有助于提高居民分配公平满意度。

就结果公平而言，要保障城镇居民在参与经济活动、平等竞争之后，获得正当的利益，付出与所得相符、贡献与收益相称。提高城镇居民的绝对收入水平和相对收入水平，无疑是提高分配公平满意度的最直接有效的手段。政府应该努力营造一个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大环境，建立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保障居民收入逐年均有所提升、收入与过去收入相比有所提高，保障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这将大大提高居民分配公平满意度。

第二，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增加物质资本积累、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是提高城镇居民分配公平满意度的有力举措。本文研究结果表明，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社会保障、家庭劳动力人数对分配公平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社会保障、人力资本对分配公平满意度正向影响程度较大。就人力资本而言，加大公共教育经费的投入，对劳动者进行多样化的技能培训和在职培训，政府要加大公共健康投资，特别是健身场所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公共健康投资向贫困地区倾斜，引导居民合理有效地进行健康投资，不仅可以改善城镇居民的人力资本，还可以增加其收入水平，提高分配公平满意度。

就物质资本，如城镇居民的住房而言，建议对购入多套住房的纳税人提高税率，避免投机者过度炒房，恶意抬高房价；对低收入者首次购入的小面积、普通住房给予减税或免税，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以提高分配公平满意度。

在制度因素方面，由于中央国有企业主要集中在金融、烟草、石油、电信、航空、铁路、电力、燃气等垄断行业，凭借其垄断地位获取高额垄断利润，体现在收入分配方面，则表现为垄断行业比竞争性行业获得了更多的劳动报酬。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吸引境外投资者，不仅承诺大幅度地减免税收，而且给港澳台及外商企业许多超国民的优惠待遇，其职工收入相对较高。因此，打破垄断、取消境外投资者超国民待遇，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对提高居民分配公平满意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就社会保障而言，建议开征社会保障税，取代现行社会保险筹资方式，打破地区、部门、行业间的条块分割，建立稳定、可靠的基金筹措机制，对完善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建议对于低收入者免征其社会保障税，建立不分地区、不分年龄、不分性别和不分职业的全社会均能享受的社会保障制度。完善对贫困地区、贫困人员、疾病患者和其他低收入群体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大对低收入群体、弱势群体帮扶力度，确保居民能够体面地生存。

（三）不足与展望

本文实证分析中使用的问卷调查数据，样本容量相对较少，在全省分布不均匀，这是其不足之处。如果能够扩大样本容量，使得全省样本分布相对均匀，将更具有代表性，研究结论也将更加可信。由于调查问卷等方面的局限性，本文对起点公平、过程公平、结果公平满意程度等方面的问卷设计可能还不够严谨，居民对分配公平满意度的判断与评价的合理性有待进一步验证。对于分配公平满意度的影响因素，本文主要从起点公平、过程公平、结果公平、户主个人及家庭基本特征、人力资本、物

质资本、社会保障等方面进行实证分析，而对社会流动（如职业流动、教育流动和户籍流动）、社会资本、婚姻状态、户籍制度等其他因素考虑较少， 这些问题都有待于在以后的研究中通过新的经验资料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

参考文献：

1. 傅红春、罗文英：《上海居民收入满足度的测定与分析》，《管理世界》2004 年第11 期。
2. 李春玲、魏中龙：《北京市农村居民收入满意度构成要素研究》，《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12 年第3 期。
3. 李雪松：《高级经济计量学》，中国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4. 李颖晖：《教育程度与分配公平感：结构地位与相对剥夺视角下的双重考察》，《社会》2015 年第2 期。
5. 栗治强、王毅杰：《转型期中国民众公平感的影响因素分析》，《学术论坛》2014 年第8 期。
6. 罗文英：《基于收入满足度数据的性别差异研究——来自上海收入满足度问卷调查的数据》，《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08 年第5 期。
7. 倪青山、罗楚亮、谢维怡：《公正观念与分配公正》，《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1 期。
8. 史振华：《城乡收入差距对收入满意度影响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15 年版。
9. 史振华：《户籍、社会资本与收入满意度研究》，《制度经济学研究》2014 年第2 期。
10. 王甫勤：《社会流动与分配公平感研究》，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2010 年博士论文。
11. 文雯：《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的公平认知与诉求》，《财经研究》2015 年第11 期。
12. 翁定军：《阶级或阶层意识中的心理因素：公平感和态度倾向》，《社会学研究》2010 年第1 期。
13. 郑方辉、隆晓兰：《基于绩效评价的收入满意度的实证研究——以2007 年广东省为例》，《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 年第4 期。
14. Becchetti L., Pelloni A., “What are We learning from the Life Satisfaction Literature”,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2013, 60 (2): 113~155.
15. Bishop J. A., Liu Haiyong, Qu Zichong, “Individual Perceptions of Distributional Fairness in China”, Comparative Economic Studies, 2014, 56: 25~41.
16. Christian B., Axel D., Justina A. V., et al.,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Income Inequality and Happiness: Do Fairness Perceptions Matter?”,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Universität Heidelberg,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2010.

-
17. Clark A. E., Frijters P., Shields M. A., “Relative Income, Happiness, and Utility: An Explanation for the Easterlin Paradox and Other Puzzle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08, 46, (1): 95~144.
18. D’Ambrosio C., Frick J. R., “Income Satisfaction and Relative Deprivation: An Empirical Link”,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2007, 81 (3): 497~519.
19. Deaton A., “Income Aging, Health and Well-being around the World: Evidence from the Gallup World Poll” // Wise D. A., *Research Findings in the Economics of Aging*,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0, pp. 235~263.
20. Dumludag D., “Satisfaction and Comparison Income in Transition and Developed Economies”,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2014, 61 (2): 127~152.
21. Eisenkopf G., Fischbacher U., Föllmi-Heusi F., “Unequal Opportunities and Distributive Justice”,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2013 (93): 51~61.
22. Ferrer-i-Carbonell A., Van Praag B. M. S., “Income Satisfaction Inequality and its Causes”, *Journal of Economic Inequality*, 2003, 1 (2): 107~127.
23. Festinger L., “A Theory of Social Comparison Processes”, *Human Relations*, 1954, 7 (2): 117~140.
24. Frank R. H., *Choosing the Right Pond: Human Behavior and the Quest for Statu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84.
25. Grosfeld I., Senik C., “The Emerging Aversion to Inequality: Evidence from Subjective Data”, *Economics of Transition*, 2010, 18 (1): 1~26.
26. Gustafsson B. A., Li S., Sicular T., *Inequality and Public Policy in Chin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19~21.
27. Han C., Whyte M. K., “The Social Contours of Distributive Injustice Feelings in Contemporary China” // Davis D. S., Wang F., *Creating Wealth and Poverty in Post-Socialist Chin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193~212.
28. Hayo B., Seifert W., “Subjective Economic Wellbeing in Eastern Europe”, *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 2003, 24 (3): 329~348.
29. Jasso G., Wegener B., “Methods for Empirical Justice Analysis: Part 1. Framework, Models, and Quantities”, *Social Justice Research*, 1997, 10 (4): 393~430.
30. Kapteyn A., James P. S., Arthur V. S., “Are Americans really less Happy with Their Incomes”,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 2013, 59 (1): 44~65.
31. Keaveny T. J., Inderrieden E. J., “Gender Differences In Pay Satisfaction And Pay Expectations”, *Journal*

of Managerial Issues, 2000, 12 (3) : 363~379.

32. Kifle T., “Relative Income and Job Satisfaction: Evidence from Australia”, Applied Research in Quality of Life, 2013, 8 (2) : 125~143.

33. Kluegel J. R., Mateju P., “Egalitarian vs. Inegalitarian Principles of Distributive Justice” // Kluegel J. R., Mason D. S., Wegener B., Social Justice and Political Change: Public Opinion in Capitalist and Post-Communist States, Berlin: Aldine De Gruyter, 1995, pp. 1~359.

34. Knight J., Song L., Gunaatilaka R.,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Its Determinants in Rural China”,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09, 20 (4) : 635~649.

35. Kreidl M., “Perception of Poverty and Wealth in Western and Post-Communist Countries”, Social Justice Research, 2000, 13 (2) : 151~176.

36. Lind E. A., “Fairness Heuristic Theory: Justice Judgments as Pivotal Cognitions in Organizational Relations” // Greenberg J., Cropanzano R., Advances in Organizational Justic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56~88.

37. Ng S. H., Allen M. W., “Perception of Economic Distributive Justice: Exploring Leading Theories”, Social Behavior and Personality, 2005, 33 (5) : 435~454.

38. Proto E., Rustichini A., “Life Satisfaction, Income and Personality”, 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 2015, 48: 17~32.

39. Robinson R. V., Bell W., “Equality, Success, and Social Justice in Eng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78, 43 (2) : 125~142.

40. Schneider S., Shamon H., “How Others’ Earnings influence our Justice Perceptions. Studying the Effects of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Social Position on Reflexive Justice Evaluations among German Employees”, SFB 882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44, January, 2015: 1~25. [2015~12~26] <https://pub.uni-bielefeld.de/publication/2768330>.

41. Schyns P., “Income and Satisfaction in Russia”,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2001, 2 (2) : 173~204.

42. Schyns P., “Wealth of Nations Individual Income and Life Satisfaction in 42 Countries: a Multilevel Approach”,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2002, 60 (1~3) : 5~40.

43. Shahpari G., Davoudi P., “Studying Effects of Human Capital on Income Inequality in Iran”, Procedia-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2014 (109) : 1386~1389.

44. Shepelak N. J., Alwin D. F., “Beliefs about Inequality and Perception of Distributive Justic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86, 51 (1) : 30~46.

-
45. Soltan K. E. , “Empirical Studies of Distributive Justice” , *Ethics*, 1982, 92: 673~691.
46. Taylor S. E. , Lobel M. , “Social Comparison Activity under Threat: Downward Evaluation and Upward Contacts” , *Psychological Review*, 1989, 96 (4) : 569.
47. Tremblay M. , Vandenberghe C. , Doucet O. , “Relationships Between Leader –Contingent and Non-contingent Reward and Punishment Behaviors and Subordinates’ Perceptions of Justice and Satisfaction, and Evaluation of the Moderating Influence of Trust Propensity, Pay Level, and Role Ambiguity” ,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Psychology*, 2013, 28 (2) : 233~249.
48. Wang Feng, *Boundaries and Categories: Rising Inequalities in Post-Socialist Urban China*,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108~111.
49. Wang Feng, “Boundaries of Inequalities” //Whyte M. K. , *One Country Two Societies Rural –Urban Inequality in Contemporary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1~445.
50. Wang Lei, Xu Shiyong, Zhang Yuqing, et al. “Is Process as Important as Outcome?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the Chinese Context” , *Frontiers of Business Research in China*, 2014, 8 (4) : 529~549.
51. Wegener B. , “Relative Deprivation and Social Mobility: Structural Constraints on Distributive Justice Judgments” ,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91,7 (1) : 3~18.
52. Whyte M. K. , *Myth of the Social Volcano: Perceptionsof Inequality and Distributive Injustice in Contemporary Chin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43, 1226.
53. Wilkinson R. G. , Pickett K. E. , “Income Inequality and Social Dysfunction” ,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009, 35 (1) : 493~511.
54. Wu Xiaogang, “Income Inequality and Distributive Justic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Mainland China and Hong Kong” , *The China Quarterly*, 2009, 200: 1033~1052.